

# 自然史博物館之蒐藏實踐

劉憶諄

## 摘要

博物館蒐藏研究(collecting study)到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影響，脫離以往針對博物館實務操作的研究層面，將博物館視為一個主要研究對象，並對博物館的功能角色產生一種反思的體認。自然史博物館透過蒐藏工作，選擇蒐藏品和進行一系列的分類、鑑定、命名、研究，乃至於管理的工作，將世界自然物與人為物加以挑選、收納，在一定的政策計畫、空間安排下系統性的進行。然而，在博物館進行蒐藏實踐的過程當中，又受到自身所處社會文化的影響，反映在社會中個體與個體間、個體與團體間，以及團體與團體間的運作機制上。特別是蒐藏者在社會文化中的條件和功能性、個體自我論述的角度以及蒐藏物件世界中一種權力操控的追求。

本文以自然史博物館為研究對象，藉由民族學田野調查方法，選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作為研究案例，期使筆者能夠真正深入、長期的進駐一個自然史博物館機構中，以人類學家觀察、訪談的方式進行本論文之研究：探索自然史博物館蒐藏工作，以及與其所處社會文化之關係。

關鍵詞：自然史博物館、蒐藏研究、社會文化、知識建構、社會實踐、詩意性、政治性

## 前言

「蒐藏創造博物館，而不同的博物館更以其特殊的方式對蒐藏下定義」(王嵩山, 2003: 55)。蒐藏之於博物館的關係如此，而面對各式各樣種類的蒐藏品時，不同性質的博物館在實踐蒐藏工作

時，各自有其一套運作體系。自然史博物館蒐藏最大的特性就是其範圍橫跨自然與人類之間，其終極關懷在於透過「自然物與人類文物」，調查、分類、研究，全面性關懷人與自然環境的生活全貌。人們有目的、有計畫的蒐集、研究工作，集體化而轉為制式的體系，博物

館蒐藏研究工作因應不同群體參與性、地域差異性、社會文化獨特性而創造不同的特性。

事實上，「由於跨過逐漸使蒐藏品成長、累積經驗和知識的漫長階段，一開始便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世界博物館情境，使臺灣在面對紛繁多趣的博物館現象時，缺乏對博物館本質上深刻的認識，混淆教育與文化功能，忽視原則而嚮往市場化，甚至面臨了迷失在需要長期累積與培育卻要求短期可見成績的國際化或追求世界第一的主體性鬆動、浮誇的困境。」(王高山, 2003: 23) 因此，儘管臺灣在早期籌劃、建構國家級博物館時參酌許多國外優良博物館的範例，甚至移植國外博物館體制，但在因應社會文化的差異後，轉變而成的臺灣版運作模式，今日臺灣博物館的運作仍有許多無法脫困的難題，特別是作為博物館最重要基礎的蒐藏工作。

本文筆者嘗試運用民族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深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進行研究，嘗試解構自然史博物館中蒐藏工作型塑、運作、發展的影響因素，解析臺灣自然史博物館蒐藏的社會性格；將自然史博物館置於整體社會文化脈絡下，結合後現代主義的理論，解讀一座國家自然史博物館蒐藏的現象。

## 自然史博物館蒐藏性質

### 一、蒐藏論述

博物館學(Museology)中對於博物館蒐藏的研究，或說是與物件的相關研究，主要可以大致區分為兩部分。其一是對於蒐藏品的研究，包含技術層面的實務研究，如登錄、編目和與博物館蒐藏品相關的執行業務如修復維護、藏品安全性等。另外，則是直接以蒐藏品為

研究對象的專業研究，如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或是藝術史、美學、歷史學等。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的發展因應後現代主義的趨向，不僅將博物館視為一個主要研究對象，並對博物館的功能角色產生一種反思的體認。西方對於蒐藏研究已歷經多年，其中主要以「物」(object)為主要的研究系統中，幾乎均以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為多數。在博物館學中，英國學者皮爾思(Susan Pearce)的人類學研究方法受人矚目。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物體系》，則由建構整個物件體系的論述中，分析蒐藏(品)的性質。

皮爾思對於蒐藏研究的探討，綜合整理西方歷來各界對於蒐藏研究的方法及論點(Pearce, 1995)。過去的蒐藏品(collection)研究因應學科型態的方法不同，分別從歷史、生物描述及個人興趣等探討，亦即是從物件本身的物理性、學科性或是物件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性、藝術性角度出發。一九三〇至一九六〇年代，主要的蒐藏(collecting)研究則從社會、經濟模式中的一部分著手，或是受心理學的影響、與人類學中社會關係建構的研究，物質文化被視為社會關係的反映、代表，有些研究則關懷經濟價值層面。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範疇中，由於各學科不同的著眼點，又可從六個方面來理解。其中包括以時間為主軸而分析物質文化在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的批判性論述，資料蒐集(information gathering)的方法學和民族誌角色的爭論，物質文化研究中社會與經濟角色的批判性論述，語言學結構中對於溝通(communication)的分析，後佛洛伊德心理學研究，以及對於知識的意識型態(ideology)與創造(production)的後馬克思主義評論(Pearce, 1995)。

前述的六大方向又可歸納為三大主

軸，分別是社會實踐(practice)、詩意性(poetic)和政治性(politics)，具體而言是為蒐藏與收藏者在社會文化中的條件和功能性、個體(individual)自我論述的角度，以及蒐藏物件世界中一種權力操控的掌握／追求(Pearce, 1995)。三者之間的區別，存在相當緊密的關連性，可由Baudrillard的收藏分析中尋出一些脈絡。Baudrillard在《物體系》中，對於作為收藏之物擺放至人的世界之物件體系裡的邊緣，這種灰色模糊地帶的角色，看似游離出人的世界之外，反而更突顯出其作為蒐藏者自我世界構築中的關鍵地位。從脫離功能性質起始，其所表現為個體激情寄託對象，導致個體為其陷入瘋狂追逐系列遊戲的循環裡，期間由對物件質量的轉換，時間、真偽之間的假象，到去結構物的變態，因欠缺與失望的外、內系統因素，止於返歸針對自我的論述（林志明譯，1997）。相對於皮爾思歸結的三大範疇中，個體利用蒐藏品／物件建立的世界系統裡，權力操控的掌握與系統外的社會文化互動之間，拉鋸著自我與他者的角色確認，相當清楚的呈現人與物之間的親密和共生。

換句話說，博物館作為社會文化實踐的場域之一，其與所處社會的人、事、物間環環相扣的緊密性，不僅在於博物館蒐藏品的研究範疇內，也包含其與該社會之互動層面。所以說：博物館雖以物為基礎，其存在目的卻是在人（包括一般民眾與學者）（王嵩山，2003）。因此可以理解，博物館蒐藏之最終關懷者，仍是推動此博物館出生的社會群眾。博物館蒐藏工作體系的運作，或可再經由Baudrillard對於物體系建構的出發點尋出一些脈絡：「我們分析的對象不是只以功能決定的物品，也不是為分析之便而進行分類之物，而是人類究竟透過何種程序和物產生關聯，以及由此

而來的人的行為及人際關係系統。」（林志明譯，1997: 2）博物館蒐藏的建構亦同，其與所蒐藏物件之間所要呈現的不僅是物件所代表之意義，更在於人透過「物件」之蒐藏背後所欲傳達的關係脈絡。

現代新博物館學對博物館機構的重新界定，其中帶有批判性的質疑眼光，也影響到博物館蒐藏工作的運作，挑戰傳統博物館學的理论與實務。擬造一種博物館政治學的論述，認為博物館是一個權力運作機構，也連帶影響到社會權力分配關係的運作(Vergo, 1989)。以自然史博物館中生物學分類系統而言，Hooper-Greenhill即曾指出：「既有的分類系統在幫助人們瞭解事物之時，是否也同時阻礙他們瞭解其他一些事物？決定哪些東西要收藏？哪些不要收藏？哪些優先收藏？哪些暫緩？在這樣的過程中，我們不也在創造知識的系統嗎？在儀式與權力關係中，某些物件特別被重視，某些事物則遭摒棄，這時候，我們不等於也是在控制建構知識的變數嗎？」（參見張譽騰，2000: 55）。新博物館學研究學者面對新一波的批判風潮，對「蒐藏」的界定，產生另一種新的詮釋角度和分析。

博物館創造知識的蒐藏研究工作，是一種權力運作的過程和結果，而認為：「對世界的馴化與分類，在多少程度上主要是源自人類追求權力的動機。」（張譽騰，2000: 57）。其中權力之拆解，實則是人透過「物件」之擁有，兌現對於操控世界的能力之占有。而在發出社會論述的同時，也同時受到社會論述影響，並對於社會「文化」有所左右。如同博物館學者皮爾思所言：「博物館和它所蒐藏的東西，是在人文或科學（如果我們硬要將知識如此細分的話）上發展知識哲學，以及整個社會參與期創造過程的產物之一。無論在理論或實

體上，我們所傳承的知識哲學產物結構非常複雜，它既帶有強烈的社會性格，也同時對社會性格的建構有其一份貢獻。」(張譽騰，2000: 25) 對應於上述的蒐藏研究的三大主軸，本文試圖解析自然史博物館蒐藏實踐的社會性格所反映出的政治性與詩意性。

## 二、自然史博物館蒐藏性質

自然史博物館是依照蒐藏品的特性所劃分出來的博物館類別，主要是引領人們去探索與人相依存的自然環境，其中包括關於人生命的一切，和人以外的生物與地球的生命。細而言之，自然史博物館在於探討人類、生物、地球之演化和生命，包含了研究動物、植物的生命科學(生物學, biology)，研究地球生命的地質學(geology)，以及研究人類科學的人類學(anthropology)。動物學包含有兩棲爬蟲類、魚類學、昆蟲學、哺乳動物學等，植物學包含各種植物標本如真菌類、維管束、非維管束等，地質學則含有礦物學、古生物學等。而人類學部分可分為考古學、民族學等。可知自然史博物館的領域主要包括有動物學(zoology)、植物學(botany)、地質學和人類學四個主要學科。相對於其他類型博物館的蒐藏性質，自然史博物館依據所蒐藏的物件建構的知識體系是最為完整，並且更帶有強烈的社會性格與建構社會性格。

事實上，自然史博物館的起源最早可推至西方的中古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人們對於自然界物品的收藏喜好，至十六、七世紀時，自然界蒐藏品漸成為人們研究的重要來源，例如岩石礦物、貝類化石、動植物標本等，使相關學科的發展臻於成熟。直到十九世紀，自然史博物館的蒐藏品更成為引導學術研究的重要資源中心。發展至今，自然史博物館更成為一般大眾企圖瞭解宇宙中人的

地位角色和這充滿驚奇神秘的自然世界的場所(Alexander, 1996)。其間自然史博物館一度成為學術研究的重鎮和來源，包括了人類學、生物學和地質學，造就各學科與博物館的深刻關係，建構了各專業的知識體系。以人類學為例，人類學和自然史博物館有深厚淵源，博物館也可說是人類學發展的起源。博物館中蒐藏豐富的考古發掘物件和民族學採集文物，是人類學家早期研究的重要物證，尤其是人類學中民族學田野調查方法未被普遍採行前，博物館內的蒐藏品是人類學研究的寶庫，成為人類學理論發展的知識殿堂。人類學家在博物館中占有重要的席位，不僅因為豐富的蒐藏品，日後更因人類學研究的成就而凸顯其重要性。例如米德(Margaret Mead)一生的研究都以美國自然史博物館為主，並大量收集了民族誌標本，充實博物館館藏，也因其對大洋洲的研究卓著，以及對社會議題之關懷，成為人類學之先驅、典範(王嵩山，2003)。

發展至今，自然史博物館的學術研究於今稍顯沈寂。究其原因，以人類學專業角度而言，也許是基於田野調查方法的採行，物質文化研究之轉向精神文化研究而造成；以生物科學而言，因為分類學研究的「演化」，走入實驗室的趨向，使大學或其他研究機構取代了博物館。再以博物館學角度觀之，一九三十年代後，博物館界以美國為首的「現代博物館運動」，突顯博物館社會教育的功能，負起博物館教育大眾的使命(張譽騰，1994)。因此，自然史博物館迎向觀眾的門大開，也賦予自然史博物館新任務和使命——展示、教育，致使博物館蒐藏研究功能漸不受重視。再者因應自然環境的變化、環保意識的覺醒、多元文化的並陳，則主張自然史博物館不能再自封於象牙塔中，而須接受自然環境的挑戰，肩負起環境保護的責任，關



切社會大眾的生存空間。新興的全球化的「生物及文化多樣性」潮流，自然史博物館進行全面性資源調查工作，時時提供社會相關資訊，傳達當代環境生態狀況，如污染問題、溫室效應問題，乃至於地震、海嘯等問題，與社會文化、社區資源加強結合，實踐其作為社會教育的任務和使命(Burcaw, 1997)。

## 蒐藏實踐

### 一、實務操作理論

自然史博物館蒐藏工作體系主要包含與蒐藏工作相關的人、事、物三大範疇。就「人」而言，與博物館蒐藏工作最直接相關的專業人員即是研究人員(curator)、蒐藏經理(collections manager)、處理標本相關之技士以及所謂的登錄員(registrar)等所形成的組織編制。就「事」而言，則是指與蒐藏運作相關的政策、計畫、作業等，就是在蒐藏工作進行過程中的事務。就「物」而言，就是蒐藏「品」本身，也就是博物館最重要的標本。

#### (一) 組織編制

歷史悠久的英國博物館對於博物館蒐藏組織，除了專業研究人員以外，是聘用一般職員——記錄員(keeper)做整理標本及分類的工作，在其蒐藏分類紀錄系統(documentation system)中並無所謂的登錄員或是蒐藏經理之職/別。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後期，英國「博物館蒐藏分類登錄協會」(The Museum Documentation Association)引進美國登錄系統後，英國博物館界才逐漸重視到蒐藏管理系統，而採用專業蒐藏人員來執行蒐藏工作(Roberts, 1988)。

美國博物館首先採用專業蒐藏管理人員，即是上述的登錄員和蒐藏經理。登錄員是總管博物館內所有蒐藏品的狀

況，給予每批蒐藏品登錄號，以統整全館蒐藏品。蒐藏經理則是在蒐藏品登錄後，處理分類的編目研究工作，以及蒐藏品入館前的採集工作。但近來在美國又轉以採用企業管理(MBA)人才來進行蒐藏品的管理工作，將企業管理的概念運用到博物館蒐藏品的管理系統上，導致博物館內人員角色的大轉變，尤其是研究人員和登錄員之間(Roberts, 1988)。臺灣科博館即是採用美國蒐藏管理制度，與其他國內博物館制度不太一樣；臺灣其他博物館的蒐藏品管理系統比較傾向於早期英國的制度。

#### (二) 蒐藏事務

博物館蒐藏工作通常會訂定明確政策為依循的方向，作為一個博物館蒐藏工作指標，指出博物館主要發展方向和特色。蒐藏政策(collecting policy)是博物館蒐藏工作所依以為據的準則，蒐藏計畫(collecting program)則是依循蒐藏政策而規劃實行之綱要。所以說「博物館蒐藏若要成功，則須積極主動並且系統化，因此光是擬出一個意義非凡之蒐藏政策是不夠的，還必須制訂一套積極確實可行的蒐藏計畫」(Ambrose & Paine, 1995: 140)。不過自然史博物館因為各學組專業差異性較大，全館蒐藏政策僅能概括性的擬定大方向以為依據，蒐藏作業細則因各學組的專業需求，可再制訂子蒐藏政策以因應。細部工作依專業學科而別，大致上可分以下幾個基本流程。

##### 1. 蒐集

各專業領域有其選擇蒐藏品的標準和方式，取得方式主要包括有採集、購買、交換、捐贈、轉移和借貸等。以往大部分自然史博物館的蒐藏品，主要來自於個人有意或無意採集而來。今日因為環境變異，蒐藏品採集較不易，尤其是人類學、地質學蒐藏品，因此多須以購買方式取得。而動物、植物學標本，

則還是以野外採集為主，植物採集又因可製作許多複份標本，也常可透過館際標本交換，以增加館藏。捐贈通常是偶然的機會，主要是由於私人收藏家轉讓，或是博物館因不符合蒐藏政策等因素而發生。轉移較屬博物館與博物館間的情況，若有博物館因某種理由而願意捐贈蒐藏品給其他博物館，則可利用「轉移」方式。借貸則通常是發生在特展情形，向他館借用蒐藏品以作為展示品。

## 2. 登錄(accessioning)

蒐藏品入館後通常以流水號方式編列登錄號，是全館共同使用的紀錄系統。登錄號的編列先於各學組的分類、編目。掌控登錄系統組織在美國博物館中是登錄室，即所謂的Registrar's Office，而管理者即為登錄員(registrar)，有別於一種所謂蒐藏經理(collections manager)的職務。早期英國博物館蒐藏分類紀錄系統(documentation system)中並無所謂的登錄員，僅有紀錄員(keeper)，而後在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才引進採用專業登錄員(specialist registrar)或是蒐藏經理的專業管理方式。臺灣科博館的蒐藏登錄系統，是採用美國專業登錄方式。

## 3. 分類、編目(cataloguing)及入庫

蒐藏品在取得博物館登錄號之後，再由各學組自行依其專業需求，分類編目並建立清楚詳細的研究等細部資料。博物館分類編目系統的目的，在於建立一套蒐藏品相關資料的研究體系，包括採集時的田野紀錄、蒐藏品相關文獻、圖片、影像資料等，以求在使用時（如研究、展示、教育）有所依據。蒐藏品經過處理以及分類編目後，依照藏品性質，由專業人員如蒐藏經理、技工將之移入博物館蒐藏庫，放置到適當蒐藏櫃／架上，並於編目卡上註明詳細位置（儲位），以利日後的使用。蒐藏空間及

設備規劃，亦是相當重要的問題。因為博物館蒐藏品的保存環境較為嚴格，以求較長久的保存時間，如恆溫、恆溼裝置，以及因應蒐藏品的特性而訂製獨特的櫃、架、瓶等，以便給予所有蒐藏品一個最完善的儲存場所。

## 4. 異動控制(movement control)

以上所有與蒐藏品相關的作業，包括登錄管理系統、編目分類系統、入藏設備空間的安排，均是為了隨時掌握博物館蒐藏品的情況。因此，凡是蒐藏品入庫後的所有變動情形，均需填寫蒐藏品異動單，如外借展示、研究使用，甚至藏品轉移、註銷等，是為蒐藏品異動控制。一般蒐藏品註銷情形較少，除非是蒐藏品受到破壞而失去其價值、意義，或是發現不符合館方蒐藏政策，或欲與其他博物館作為交換等因素，才有可能進行註銷程序，將蒐藏品轉移出館的情形，以完成該蒐藏品由館內註銷而轉移出去的手續。

## （三）蒐藏品

蒐藏工作汲汲營營的進行，即是為了蒐集人與自然界的物件，也就是博物館蒐藏品。蒐藏品是博物館存在的基礎，是博物館用以建構知識體系的依據。博物館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去採集、分類、鑑定、研究、保存種種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標本、文物，以瞭解生物、文化多樣性，並與其所存在的地區和其他社會文化中個人、機構建立緊密的連結關係。

博物館蒐藏品的採集、研究整合為資源調查資料庫，作為政府政策議決的依據，譬如瀕臨絕種生物的消息，可提供政府推行保育法令的參考；又如歷史文化保存的推動也是需要專業的學術研究基礎，使政府得以瞭解如何進行文化的保存、傳承工作。並且，近年來也漸漸重視蒐藏品的生物性和脈絡性，因而在蒐藏時不僅蒐藏「物」本身，也要採

集、蒐藏與該物件相關資料如田野採集紀錄中生態棲息地描述、與文物相關的背景資料等。同時，如果可以掌握其他博物館對於該物件的蒐藏情形，與該物件深入的一手與二手資料等，將可建立更完整的資料庫。同時因應全球化的來臨，蒐藏品管理電腦化作業使蒐藏品資料庫不僅在館內可以使用，並且拓展到館外，乃至於世界性的蒐藏資料系統，更是指日可待。

## 二、實例介紹

一座國家級的自然史博物館蒐藏是作為該國社會文化、知識體系建構的基礎，並負有因應生物多樣性、文化多樣性而擔任國家資源調查、發展、利用與維護等任務。因此，蒐藏之性質與目標與博物館的建館理念與使命等緊密相扣。科博館是一座臺灣國家級的自然史博物館，根據其於民國82年出版之《一座國家博物館的誕生》一書，明白闡述該館蒐藏與研究之基本目標在於：「建立國家性自然物（包括人類遺物）之收藏與研究，並協助各級學校達成其教育目標。」次目標則為：「（1）就臺灣地區之自然物作有系統而完整之蒐藏與研究。（2）對全國性與世界性的自然物作有系統的、選擇性的蒐藏與研究。（3）有系統的製作、保存具有教育工具性的自然物標本，以應全國之需要」。民國88年出版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介》中，更進一步說明其建館任務乃是「負起傳統自然歷史博物館之任務，對自然物與人類學遺物進行蒐藏與研究」。此外，並提及最近因應生物多樣性及整個世界自然史博物館之蒐藏研究潮流，須再肩負起「資源調查」之任務，在學術研究之餘亦應協助政府於「資源的發展、利用與維護上，提供基本的資料」。因而擬定了「詳細的近程蒐藏計畫，希望在較短的時間內，對博物館所在地的

臺灣，完成基本的調查與研究，並大量的蒐集標本，作為研究的基礎」。

基於以上目標與理念，科博館制度化蒐藏工作，建立一套運作體系，分以相關的人、事、物三項簡介如下。

### （一）組織編制

早期科博館籌備處組織，僅以籌備處下設研究規劃、工務、總務三組。事實上當時也並無進行真正的蒐藏研究工作，一切均在為開館作準備。真正的蒐藏工作起始，如蒐藏計畫所規劃的，依照分期建設的原則，是從民國74年開始，展開其近程目標之十年蒐藏計畫工作。民國74年雖仍屬籌備處時期，但已依「任務編組」將研究規劃組分成蒐藏研究組、展示組、科學教育組及資訊組，蒐藏研究組正式開始進行其蒐藏研究工作。民國75年元旦第一期開放，隔年科博館所提之組織條例通過，結束籌備處時期，同時蒐藏研究組成為該館一級單位。同年國科會也審核認可科博館為其研究計畫之補助單位，蒐藏研究組人員開始申請研究計畫進行研究工作。民國79年該館再向教育部提出組織條例修正案，希望可將蒐藏研究組分成動物學組、植物學組、地質學組、人類學組以及典藏管理組。組織條例修正案直到民國86年3月才經立法院通過，蒐藏研究組於民國87年3月正式擴編為動物學組、植物學組、地質學組、人類學組以及典藏管理組，而為蒐藏研究區五組分立之現況。

科博館當初為落實所謂蒐藏「管理」系統的完整體系，卻因政府人事精簡等因素，遲遲無法成立典藏管理組，因而先於當初蒐藏研究組之下成立「登錄室」。於此之前，科博館對於蒐藏品之登錄，雖亦以流水號編排，但均是由蒐藏研究組中採集者（包括研究人員和蒐藏經理）自行順序登記於行政室中的一本登錄簿上，各人筆跡不同，記錄方式亦



異，因此顯得雜亂。而後登錄室成立於民國81年底，當時只有一位組員負責，依於蒐藏研究組之行政室中，統籌所有蒐藏品之登錄工作，並開始清點、整理科博館蒐藏品。而蒐藏品編目分類系統，則賴各學組之蒐藏研究人員，包括研究人員、蒐藏經理、技術員、技工以及義工等。其中有所變異則在於蒐藏經理一職，因為蒐藏經理原是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之助理研究員聘任，而後因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更改，助理研究員須有博士學位，蒐藏經理聘任條件只須碩士學位，因此凡是在民國87年以後進用之蒐藏經理，則以研究助理職稱聘任。

## (二) 蒐藏政策

科博館自認因缺乏蒐藏品為基礎，因此建館之初即認為應該制訂蒐藏計畫，分期建館並分期實施蒐藏研究工作，方能達到建館理念與目標。事實上，科博館在籌備處時期並未立即著手蒐藏工作，而是先行調查民間收藏家，以瞭解臺灣自然史標本及文物之收藏情形；同時輔以委託計畫案，商請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人類學四個專業領域之知名學者評估博物館之蒐藏方向、範圍、目標等。而後由館方研究規劃組人員綜合整理，擬出十年之蒐藏計畫。

蒐藏計畫、目標之執行，具體之呈現可由各年度的預算總表中之博物館業務：自然物蒐集研究之工作重點中瞭解。回顧蒐藏研究工作開始之年度，亦即民國74年至民國80年之間，科博館對於蒐藏工作之重點在於：「1.標本蒐藏庫之建立，2.收藏電腦化，3.充實研究室設備，4.與國外博物館合作研究自然物並加以蒐藏，5.繼續臺灣本土標本採集蒐藏工作，6.第三、四期設計規劃工作」。民國81及82年度，除上述之工作重點外，更為因應第三、四期展示開

放，因此列有分支計畫概況表，其預期成果在於建立全國性標本蒐藏庫，以及完成第三、四期設計規劃。

完成以上重點工作後，民國83年度的重點工作定為：「繼續採集蒐藏自然、科學標本與資料之蒐集、製作、研究：1.加強國內外相關學域之學術交流，撰寫出版學術報告。2.建立精密儀器中心及充實蒐藏研究設備。3.整理蒐藏品及相關資料供本館展示。4.本館標本蒐藏管理電腦化之規劃。5.參與本館科學教育活動之設計、規劃、諮詢服務及導覽解說」。直到民國86年工作重點又些微變動如下：「繼續採集蒐藏自然、科學標本與資料之蒐集、製作、研究：1.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撰寫出版學術報告。2.蒐集臺灣本土及鄰近國家自然科學標本及資料。3.整理蒐藏品及相關資料供本館展示。4.本館標本蒐藏管理電腦化之規劃。5.參與本館科學教育活動之設計、規劃、諮詢服務及導覽解說」。

因此具體的來說，重點工作改變有三個階段，除因應館方不同階段開館計畫以外；也可看出科博館逐步完成之工作，如蒐藏研究設備的充實和精密儀器中心的完成。日後便鎖定在蒐藏品之繼續蒐集、蒐藏管理電腦化系統之建立、國內外學術研究交流、合作，以及配合該館之展示、科教活動。

## (三) 整體蒐藏工作發展

整體來說，科博館早期預計十年近程目標是為藏品達到200萬件，但至民國82年止，該館之蒐藏量四個學組總計僅達十八萬零五百三十二件，可以推測另一個十年目標，絕對無法達到預期蒐藏數量。更進一步推測，原先擬定的蒐藏中、長程目標之蒐藏計畫亦必受到影響，但發現並無因計畫受到延誤之對應措施或是進一步改變原本蒐藏計畫目標之資料。不過在該館於民國82年出版之



《一座國家博物館的誕生》中對於蒐藏目標則分有基本目標、次目標，且民國86年6月出版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研究簡介》也列出蒐藏之範圍，不過均已不再提及蒐藏「數量」。其中蒐藏範圍與民國76年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收藏計畫修正版》比較後發現，原先所列之範圍已刪除了「農學、醫學等與自然科學有關之蒐藏」部分（註1）。

蒐藏數量原不能列為蒐藏目標之唯一依據，因為蒐藏意義需要搭配蒐藏品質的實現。所謂的蒐藏品質在於蒐藏品本身的價值（包含實質的珍貴性與學術研究價值等），以及蒐藏品是否能夠擁有完善的管理系統，使蒐藏品得以發揮應有功能，以凸顯其價值與意義。也就是蒐藏本質的意義——連結人類與物件的關係，此關係在博物館中可以反映在研究使用、展示教育，以幫助人們探索、建構自然與文化秩序，傳達、詮釋博物館蒐藏呈現之訊息。不過，科博館雖不直接以量作為工作重點所在，但年度報表中「數量」績效之要求仍是蒐藏工作的考核重點。

## 蒐藏實踐案例分析：以科博館為例

以下即依照上文中科博館實例為主，依序分以蒐藏編制組織、蒐藏政策等，以館內、外因素分析一座自然史博物館在實踐其蒐藏工作時如何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互動。分析基礎來自筆者於1999年7月至2000年4月間於科博館所做之二十七份正式問卷訪談結果（問卷內容如附錄）、非正式訪談與平時觀察之田野日誌，再配合館內歷年行政資料與報告（註2），以及工作與田野觀察。

### 一、個人實踐蒐藏工作分析之一

#### （一）組織編制

組織編制無法僅就博物館專業考量，並常受制於社會文化的認知。科博館規劃組織編制時雖參照國外許多大型自然史博物館組織的體系，但落實於臺灣之審核過程中，造就出「臺灣版」的模式（註3）。蒐藏研究組織編制可分為二個部分來看：一是人對於「物」的管理系統，二則是人對「人」的管理體系。

人對「物」的管理，可由蒐藏研究系統出發，包含研究人員、研究助理、高級技術人員、標本製作技術人員。其中最具影響力者主要是研究人員和蒐藏經理。

##### 1. 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在早期科博館籌備時期，是屬於所謂的研究規劃組，其肩負的工作是在於全館規劃、常設展示，以及籌備蒐藏工作。蒐藏工作的前置作業是先從臺灣收藏現況調查開始，再以專案計畫方式委請學術界知名學者協助指導日後蒐藏工作，以充分瞭解臺灣既有蒐藏狀況與知識體系。而後再研擬蒐藏計畫，明列蒐藏預期進度、蒐藏目標等，逐步推動蒐藏工作。直到組織編制通過，蒐藏研究組成立，又進用較多研究人員，才擬定蒐藏政策，更進一步建立完整的蒐藏體系。期間研究人員並出國觀摩考察，學習歐美以及日本的博物館經驗，推動科博館運作，促使蒐藏制度漸趨完備。可知，科博館蒐藏工作由規劃、學習、發展至今，研究人員居於重要決策角色。

實際蒐藏工作如選擇、蒐集、分類、鑑定、研究、詮釋蒐藏品，也是由研究人員執行。即是以其個體專業能力選擇蒐藏品，並進而鑑定、研究以建構一套以物為基礎的知識體系。知識體系的建構是持續性、系統性，依照既定的目標與計畫長久經營，並且與相關的社

會文化、社區資源與自然環境結合而整合為有效性、實用性的資料庫。然而個體實踐蒐藏的同時，可能受制於個人專業、人力不足、編制組織調整等而可能呈現不同的面貌。例如：「我在臺灣已經採完了，所以我要去大陸、東南亞採集。」和：「我進來博物館有一個理想，就是希望可以將臺灣的××採集齊全，建立一個完整的××研究系統。」以及：「現在這個學門就是我一個人，我的能力有限，當然就是以我的專業範圍為主，我能採的就盡力採，某天如果我離開了，這個學門換人了，可能採的東西又不一樣了。」

## 2. 蒐藏經理

另外一個在研究系統中與「物件」關係密切的就是國外所稱的蒐藏經理，主要執行與「標本」的相關事務，如採集、編目分類、標本製作、維護管理等。臺灣以往博物館雖編有蒐藏品的管理人員，但在公立博物館中是由行政人員兼職，並無專業人員來執行。科博館首創引進國外專業「蒐藏經理」的概念，不採用一般行政人員，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研究助理」的職稱來聘任，或是由「助理研究員」一職取代。早期規劃時的「研究助理」是被視為未來研究人員儲備人才的來源，因此由科博館蒐藏研究人員職權劃分中可知，蒐藏經理被設定在研究兼管理標本的角色上。然因新制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及領導者的認知不同，對新進蒐藏經理一職有不同的詮釋和權責的界定，依據筆者訪談，得知有些蒐藏經理當初應徵時被告知的職務範圍僅為「標本管理」而已，研究工作是由研究人員執行。與上述將蒐藏經理設定在研究兼管理標本的角色又不同，產生角色混淆不清的詮釋。

但無論如何，蒐藏經理執行對於「物件」的管理工作是無庸置疑的，而其

也同時執行部分蒐藏品之蒐集工作（註4），與研究人員不同之處在於蒐藏品的管理工作，如蒐藏品入館前的檢疫處理、編目建檔、指導技工將蒐藏品入庫上架、定期檢視蒐藏品狀況、蒐藏編目系統電腦化作業等。換言之，除蒐集藏品外，研究人員是處於研究使用者的角色，蒐藏經理是處於管理維護的角色。在研究人員與蒐藏經理之間，因為管理維護產生監督的隱性動機，加上角色混淆問題，使兩者間產生微妙互動關係，而此關係又可延伸至下面所要提及的「典藏管理組」，也隱含了管理系統中的第二點，對「人」的管理體系。

## 3. 典藏管理組

典藏管理組成立原意乃是為了統整所有館內蒐藏品行政事務，包括蒐藏品登錄；館內外借出入異動狀況；蒐藏品因借用、外送處理包裝、保險等。此不唯蒐藏研究區之蒐藏品，還包括館內其他蒐藏品（註5）和向他館借用的蒐藏品等。然而蒐藏品行蹤訴諸於「人」的管理系統之下，欲掌握蒐藏品行蹤，則無法脫離「使用人」的管理問題，因此造成「人」之被掌控和監督的聯想。若依正常模式，此與蒐藏品最直接相關者即是蒐藏經理，而微妙的互動與上述研究人員聯合產生糾纏的「三角關係」，而蒐藏研究區之三角關係，若再加入全館之互動後，更產生跨組室的人事管理系統，即是筆者所謂對於「人」的管理系統。

實際訪談與連月的觀察發現，其成立的良意和目的，未能真正發揮作用，與其隱含的監督動機有關。先由理論上談起，有人認為：「若由『經營』的角度來看，若經營得當，並不需要成立；但若由『管理』的角度來看，因為經營不當，所以才需要一個管理的單位來執行監督的工作；而蒐藏研究組織的混亂已經造成，則問題未解決之前，再成立

新的單位，只是徒增混亂而已。」

再就研究使用觀點來說，因應各學組標本特性不同，對於蒐藏品管理方式的認知又有所差異。研究者／使用者較希望所研究「標本」可在身邊，隨時可以取用、研究，因此對於蒐藏品之管理傾向於「方便」為原則。表示：「對我們來說，標本都是很重要的，我們會將它視為研究的證物，並且會好好珍惜它；而管理者只是單純將之視為一個個的編號，對他們而言沒有意義，也就不會像我們一樣認為標本很珍貴。」

蒐藏經理任用與典藏管理組制度的用意均在於希望藉由國外專業管理的觀念來執行蒐藏管理工作，以取代以往公立博物館行政人員的角色，在執行過程中因為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使「移植」自國外的編制組織產生不同的運作模式，形成人與物之外的插曲。

#### (二) 蒐藏政策

科博館蒐藏政策於民國79年制訂，又於民國86年修正經館務會議通過，並發給各學門蒐藏經理留存以為依據。各學組再制訂子蒐藏政策或是作業準則，明列各專業學組、學門的蒐藏目標與計畫；大都是以地區作為其蒐藏工作之目標，如同全館蒐藏計畫般，分近、中、長程目標，依照地區遠近如臺灣、大陸、東南亞漸次擴展蒐藏版圖。例如鳥類標本之採集因為臺灣鳥類協會團體之保護、國家法令的限制，以及整體環境的改變等，以臺灣而言，已不可能採集完整種數。但如以兩棲爬蟲為例，則臺灣蛙類一年內幾乎已可採集齊全，便可前往大陸或鄰近國家地區如東南亞去採集。再就地質而言，臺灣屬新生代地層，要採集能完整代表各地層年代的標本，並不容易；而臺灣大多數化石已為民間收藏家所有，因此採取鼓勵捐贈或購買的情況較多。這也是蒐藏數量無法如期快速增加的原因。

當然，執行蒐藏的研究人員因為研究專業的取向，也會有多少的影響。以某學門而言，研究人員表示：「近程之蒐藏目標就是以個人研究為原則，換人就不一樣了。」另一學門之研究人員也說：「博物館因為個人之研究所做的蒐藏工作，也有很大的影響，因為人就是這麼多，能做的也就有限，現在是這樣，以後如果換了研究人員，其研究方向不一樣，可能整個蒐藏方向也會不同。」

另外，因應臺灣社會文化的特性，公立性質的科博館面對更迭頻繁的領導者，蒐藏工作的實踐也較無法一以貫之。某館長尊重蒐藏研究區，提供相當的彈性空間，使蒐藏研究工作為人津津樂道。某館長重視蒐藏數量，要求蒐藏研究人員積極蒐集標本。事實上，做為一座國家級博物館，欲確切掌握發展方向，蒐藏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關鍵角色。沒有計畫性延攬或聘僱與博物館蒐藏研究方向有關之人員，博物館無法發展出所謂的特色外，系列遊戲中對於完整性的要求，就總是在欠缺的失望中忙碌而已。這也是筆者訪談過程中，許多研究人員提到的地方：「好像這座博物館擺在哪裡都可以似的，蒐什麼都行。」或認為：「博物館最重要的就是發展特色，像哈佛大學之植物標本館，就只蒐 glass flower，就只研究那個，全世界都沒有的，那就是特色啊！」

理論上，博物館蒐藏政策是蒐藏工作執行準則，但執行過程中可能因為上述的幾種因素——整體環境因素、個體專業領域、人事更迭等而呈現實際的運作模式。

#### (三) 專業認知

博物館並非是一個純粹學術機構，但也非純粹教育機構，更非一個行政單位而已，博物館工作人員能否正確認識機關性質與專業，也是重要關鍵。蒐藏



工作執行過程中，非蒐藏組室人員的認知有時也會直接或間接涉入其中，而產生互動上的現象。如同訪談時，有三、四位受訪者表示，每一組室工作性質殊異，「應該讓他們來做做看就知道我的辛苦了」，甚至有人認為「上面的人下來實際做三個月，他就會知道為什麼這麼花時間。」每每談及此，資深一點的受訪者幾乎也都不禁有些感嘆：「好懷念以前某館長在的時候，大家不分彼此，什麼都一起來，一起想，團結一心只為這個館。」或又感嘆：「這個館越來越像某博物館了，走回頭路了，唉。」這麼多的嘆息和無奈，依然來自於前述所謂的共識和認同的問題。就像有受訪者表示：「我常常想只有蒐藏區那些研究人員才能叫研究人員，才是真正的研究員，我們瑣事一堆，根本無暇作研究，連看本書都難。」蒐藏研究區的工作沒有被正確認識與理解，其所必須擔負的蒐藏研究工作之餘，肩負所謂展示、科教的諮詢角色時，便更容易產生互動上的困境。以展示為例，展示規劃就常造成「孤軍奮鬥」的無援狀況，或是「獨立自主」的堅毅表現，此無疑也指出，博物館互動的問題已經左右博物館的蒐藏工作，所牽涉的即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綜合來說，博物館在進行蒐藏工作時，利用物件的蒐藏，釐定系列遊戲的計畫性政策，到追求特色的要求；以及在進行過程中個體干預，而不斷遭遇欠缺、失望的出現，到蒐藏品的不斷置換取代的擺弄支配；最後回歸自我真實的原動力，堆砌博物館的知識建構體系。

## 二、個人實踐蒐藏工作分析之二

就博物館學理論來說，影響博物館經營管理主要有三個因素：博物館的主導單位（博物館直屬單位）、博物館本身的管理體系以及博物館的實際運作和管

理者(Ambrose & Paine, 1995: 230, 231)。後兩項已於前述分析之一中提及，此處所要探討的即是將博物館推至其所處之社會文化脈絡下，直接、間接與蒐藏工作相關，卻影響到博物館蒐藏工作之館外影響因素。

### (一) 政治影響力

當初科博館之建立就是一項國家政策，即行政院所決議的國家十二項建設中文化建設之一。因此舉凡選擇考察團成員、決定博物館所在地點、指示成立籌備處，以及組織章程、人力規劃、收藏計畫的審核，乃至於分期建設計畫、經費預算等均需透過正式的政治程序來審核才能執行。以下仍先由組織編制談起。

#### 1. 組織編制

科博館的組織編制是仿自國外自然史博物館模式，特別是英、美的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雖是國立機構，直屬單位為美國國會，但實則是由史密森機構(Smithsonian Institution)統轄。該館組織編制是採學術體制的編組，各學術專業研究單位如人類學、植物學、昆蟲學、古生物等，均是直屬於館長，是屬該館一級單位。其餘如展示、教育、行政事務，乃至於登錄室則是由副館長統轄不直接向館長負責，與學術組室之層級不同。館長直接向史密森機構負責，諸事如年度預算、專業計畫、人事案件等，雖需經由該機構批准，然事實上該機構均尊重該館決定，由其自行經營管理和運作發展。人事任用案以組成審查委員會決議，由館長任用，向史密森機構報備（秦裕傑，1987）。

英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原屬於大英博物館，後於1881年獨立運作。由董事會(Trustee)監督，屬於藝術與圖書館部(Office of Arts & Libraries)管理，董事會共有董事十二人，其中八人由首相提名



任命。館長由董事會提名，報經藝術與圖書館部部長轉請首相同意後任命；人員由館長提董事會報由主管部（即藝術與圖書館部）決定，除員額增加需得財政部同意外，博物館人員任用由各館人事主管依人事法規辦理即可。而組織編制不論是學術各組或是其他行政、圖書、公共服務等均直屬館長，與美國之編制不同。

反觀臺灣第一座自然史博物館（即今之國立臺灣博物館），組織編制是由館長統轄而分屬各組室——植物學組、動物學組、地學組、人類學組、推廣組、行政室、人事室、會計室，與英國之編制略同。館長由主管單位（即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直接任命，除學術組外，均需公務人員資格，亦需通過公務人員資格考試。其前身是為臺灣省立博物館，更早乃為日本時期「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為日本統治臺灣時，掌理調查臺灣島自然與文化環境之處，蒐藏有關之標本文物。雖與科博館同為臺灣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但其「以臺灣地區人類學、地學、動物學、植物學標本文物之調查、研究、蒐藏、展示、教育為宗旨」（註6），並表明是為臺灣本土自然與文化之研究為主，因此與科博館所標示之國家級博物館目標，以漸進式的方式蒐藏全世界之自然物與人類遺物有所區別。而科博館隸屬行政院教育部，其館長由教育部部長直接任命又與其不同。科博館目前的組織架構是採英、美兩國的綜合（註7），人事任命可分為行政人員與專業人員進用方式，分別組成審查小組決議。審查小組成員不定，視招考人員之專業而定，但均須報直屬單位核准通過，整體來說較傾向美國制度。

綜合來說，國外組織編制與國內最大之差異，在於直屬單位與博物館之間的彈性組織，以美國而言是為史密森機

構或是財團法人組織，英國則是所謂的董事會，使得雖同屬國立機構的博物館運作，有一個緩衝的彈性空間。政治影響力於人事任命的主導權上，不僅在於領導者的直接任命，也包括社會體制所賦予的先天條件，各有不同的干預程度。但主導意識的多寡，與執行力的成敗並非形成正比級數的絕對關係。事實上，這又與社會文化有著密切關連性。上述之經營管理，亦即博物館運作與此緊密相連，蒐藏工作也因而受到影響。

## 2. 蒐藏運作

科博館的組織編制仿自國外博物館組織編制，在臺灣算是首例，政府審核時常常無所依據，更因缺乏博物館概念而不知如何舉措，僅能邀集當時所謂的「相關」人士研議而做出決定（註8）。民國75年《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一、二期營運績效評估暨三、四期建設計畫》中已提出制訂「博物館法」之必要，至今臺灣博物館四處林立，依然無「法」可循。博物館法草案實則早已擬定，卻遲遲無法通過。此外，臺灣博物館的「管轄」機關也各有不同。同為國家級之自然史博物館，科博館直屬教育部，而國立臺灣博物館則直屬文建會。其他各類型博物館如臺灣三大美術館、小型地方博物館或是地方性文化中心等皆分屬不同機關，運作經營僅能依據上級非專業考量與經費狀況，沒有固定的計畫，即使有也不見得能夠順利進行。

蒐藏研究隱身於博物館展示教育之後，卻是博物館經營的基礎，初始並不為臺灣政府所理解，因此科博館早期規劃時，需極力解釋蒐藏研究之重要性，才爭取到今日蒐藏研究組之組織編制。但其他博物館組織編制中行政體系的強勢仍屬最多數，博物館法之無法制訂，博物館專業無法被認同，蒐藏研究工作仍有困境。近年來，臺灣博物館的專業知識雖然已經被熱烈討論，也有許多學

成歸國的專業人員，甚至國內也不乏專業的學校科系，但博物館蒐藏運作與國人對於博物館專業的認知仍然很難有效推展。而臺灣博物館的混亂情形除無法可依，與直屬單位混亂之外，近年來熱絡討論的「行政法人化」議題又是另外一個聲音，博物館經營績效因受自身社會文化的獨特性影響，機構體制的僵硬與專業認知的差距，個體運作的作風差異，行政法人化未有健全配套措施之前，並非理想的解決之道。

反觀國外自然史博物館之實例，可顯出因應國情之差異。十九世紀西方帝國主義之風氣，造就許多地區的殖民化，博物館蒐藏品暴增。諸如今日大英博物館中許多異國文物蒐藏品，日本在臺灣設立自然史博物館蒐集標本，進行對於臺灣資源之研究，並蒐集大量標本至日本蒐藏、研究。乃至於美國史密森機構剛成立不久，國會為對北美洲地區有進一步的瞭解，指示美國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探索開發新版圖(Exploring New Territories)的計畫也如火如荼展開(註9)。國外自然史博物館發展至今，英國雖無統一的博物館法以為依據，但國立大型博物館有其獨立法規可循，如大英博物館有組織法規，其他各館則有統一的「博物館與畫廊委員會」管理，以固定財務贊助、訓練專業人才、強力支持蒐藏研究工作等。各國因應國情不同，博物館發展歷史長短之差異，則有不同的著力點。

## (二) 社會影響力

國立博物館直屬單位為國家機關，其政治運作左右自然史博物館蒐藏工作的實踐時，社會文化亦或多或少涉入其中，成為個體、團體間透過社會、政治形式的運作，發揮其影響力。政治形式是以政府力量在合法程序下，直接強力干預的情形已如上述，而社會中個體、團體涉及之力量，則是透過以下的形式

運作。

### 1. 私人收藏

私人收藏大量增加，造就文物大量流失，卻也促使私立博物館不斷成立。以臺灣為例，化石與文物的收藏最為普遍。在科博館收藏計畫中便指出，因為許多蒐藏品已為民間收藏家所有，必須採取購買行動以獲取蒐藏品，但因蒐藏品並無明確的市場價格，僅能會同專家商議出一個較合理的價格。至今收藏家大量增加，文物市場已有一些共同「行規」，私人博物館之風也頗為盛行，影響所及是文物市場的熱絡與變動。較常與文物收藏家接觸之研究人員指出：「現在私人博物館的增加也一直在刺激和威脅大型博物館。且收藏家對於文物的哄抬價錢，也會造成市場的混亂，出現很不平衡的狀態。」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此種關係是互為影響的。今日博物館作為研究機構已為社會所接受，博物館蒐藏研究專業視為文物價值判斷標準之一，因此博物館此時若不能堅守倫理規範，「加入文物市場行列，則博物館不但違反倫理，也會高估文物之價值，變成收藏家利用的工具」。因此，博物館蒐集藏品的同時，其購買行動受到文物市場影響之餘，其決定購買的蒐藏品也間接影響到相似蒐藏品之價值。此外博物館若因一時之錯判，購買複製品而不自知，也可能成為贗品的保證與背書。文物市場機制出現後，私人收藏家與博物館之間具有一種「購買」、「鑑定」的互動模式，展開一系列的權力運作體系，互相形成制衡與拉鋸關係。

### 2. 社會／文化認知

因為科博館規劃完善的蒐藏庫、櫃、架，是學校專業教學的場所，也是臺灣其他博物館前來觀摩的範本。且蒐藏品的使用並不限於館內人員，凡館內、外相關人員基於研究、教育等非營

利目的，均可向科博館申請借用藏品，管理系統的工作更顯重要。但也因與館外互動頻繁，顯出社會影響力之處。訪問中即有研究人員指出：「館外來借用蒐藏品作碩士論文研究，有不少。以前剛開始都很樂意借給他們，反正是為了研究嘛！但是發現他們的規矩很差，標本隨便拿、隨便放，小一點的標本甚至都被偷拿回去了，一點都不值得信任，很討厭。後來就比較不喜歡借人家研究，可是中國人就很糟糕啊！不借他就動用關係，××都來說了，能不借嗎？外面的人完全不尊重這個系統。」

對專業的尊重與認知是關鍵。以博物館工作人員為例，特別說明此處雖以館內人員為例，但脫離上節分析之館內篇來談，乃因此部分所牽涉的深層要素在於「社會文化」的層面。是在於專業認知的「應然面」和「實然面」之間。理論認知是為基礎，而實際運作所產生的經驗，比照之下必有差異。差異多寡、差異所在是本文所關注的焦點之一，因此在問卷中才有所謂蒐藏的「定義」問題。筆者訪問時，常得到的回應是「書上就有了」或「去看書就知道了」或「這還用說嗎」等。深入瞭解可知，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受制於學校、社會教育的影響力相當重要。如同波赫居(Pierre Bourdieu)所言：「能夠形成辨識能力，或所謂的個人意見，更是受過教育所帶來的結果。」而「能夠丟棄學校所加諸的束縛，更是某些人才有的特權」(林明澤譯，1997: 265)。丟棄學校所加諸的束縛乃意味著有其獨立思考能力，而非為制式的應然思考邏輯。

換言之，個體從出生到社會化過程中，「教育」是一種最直接、最明顯、最系統化的干預力量，此種力量「促成文化，使文化變為天性，一種培養出來的天性，具有一切『天賦』與『恩賜』的樣態，。」(林明澤譯，1997: 268)

博物館蒐藏工作的實踐，社會影響力除上節中所提執行者直接相關、上述私人蒐藏家與蒐藏品取得方式外，個體與個體在館內外之間也互有一些影響力存在，並且這種影響力深層追溯是來自於個體所不察的不自然因素。個體非生而如此，社會文化賦予人的一種包袱，透過制式的教育過程培養起來，串連而為一股社會認知，進而影響個體日後生活的各個層面。

### 3. 社會活動

博物館蒐藏隨著世界潮流、社會趨勢改變，蒐藏工作因為整體世界自然環境的變化而受影響。先就自然標本談起，因為自然環境的破壞，使得採集環境大不如前，許多生物更面臨「滅絕」的危險邊緣。也因此，關懷自然環境的人士組織環保團體，以保護自然環境免於再受破壞。博物館蒐藏工作常被誤認為是自然環境破壞者之一，與環保團體之間便產生衝突。科博館研究人員出外採集便曾經發生過類似經驗：「那一次，根本還沒有去採，報紙就亂寫，結果就遭到保育團體的抗議，後來就沒去採了。」但事實上：「博物館的採集一切均是在合法的原則下才去進行的，但是採集申請很多時候都很麻煩，常常在公文往返之間已經浪費許多時間，就不如等人家送屍體來，但完整性就差了，有時候只能去某部分來作某一類標本。」這是博物館蒐藏工作困境之一，也是博物館蒐藏已經不能如以往可以大量蒐集、製作各式各樣標本的原因。

再就人類遺物和異文化文物來看。文物市場與博物館蒐藏互動情形已如前述，而文物幾已為私人收藏或是其他博物館所蒐藏，原住民族意識抬頭等，造成田野調查時無法輕易採集文物。私人收藏活動影響博物館蒐藏工作已如前述，而原住民意識抬頭，如美國原住民對於博物館所蒐藏的文物，已有要求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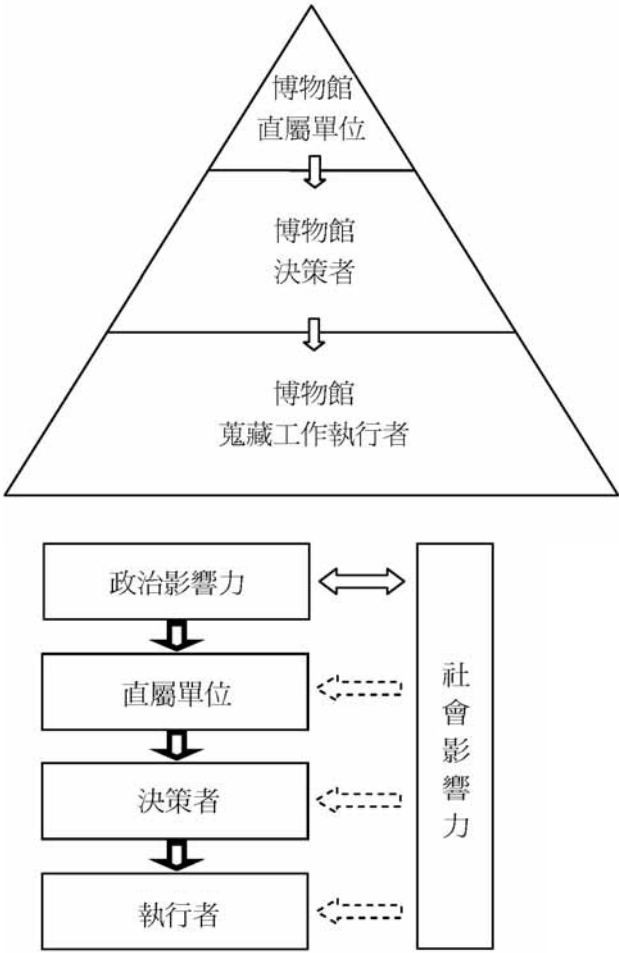
還的行動，也漸漸影響到臺灣的原住民族。另外，考古遺址的發掘亦受到影響，如：「現在面臨到城市發展和文化之間的衝突，譬如道路開發和遺址所在地衝突，現在都是叫人趕緊發掘出來，或是覆蓋回去，沒有繞道而行的，這是很糟的，但目前很難改變。」並且儘速發掘出來後的文物，若無妥善處理以及良好的保存環境，只會加速對文物的破壞；若覆蓋回去，則道路於其上而行，勢必會影響到遺址原貌，取捨拿捏之間判乎一念之際。環境改變與社會文化活動有著密切關係存在，也進而影響到博物館蒐藏研究工作。

總結來說，館外因素涉入博物館蒐藏工作除政治直接干預外，社會因素中實則牽涉到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結語**

無論自然史博物館是因應生物多樣性而蒐集自然物證，或是因為文化多樣性而進行文化保存的工作，人研究、瞭解與自身生存密切相關的環境，其出發點仍回歸至人本身。進行蒐藏工作的過程中，制訂系統性的計畫、政策，編制完整組織體系，設置完備的蒐藏環境，提供充足的預算經費，卻仍無法達到理想的預定目標。深究之，歸結影響自然史博物館館內蒐藏工作可由以下三個主要面向來理解：博物館直屬單位、博物館決策者、博物館蒐藏工作執行者。三者的關係由以下之簡圖來說明：

而上述三層面向運作過程中，又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具體而言是為政治與社會影響力，但事實上政治影響力又受社會文化之影響力所左右，如下圖：



雖然實際執行者在進行蒐藏工作過程中具有行為的主控權而呈現個體蒐藏的特性，但個體所受其生存社會中之文化教養，是關鍵所在。蒐藏工作的分析中，筆者雖大要分以館內與館外的影響因素，作為觀察現象的理解，但實則此種分類乃為分析之便，而其間之相互關係卻是無法完全剝離，反之是互為循環，互為影響。總結來說，無論是館內的編制組織、政策、人員，或是館外的政治影響力、社會私人、團體活動之干預，真正癥結在於個體的參與過程中，其認知所涉入對於蒐藏工作的行為干預、支配性。換句話說，個體因素是重



要的影響力，再推演個體的自然出現，經過生存環境的適應而為具認知、思考、判斷力、決策行為的行動者，人在社會化過程中與其所生存的環境緊密相關。此生存環境包含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社會環境是因應自然環境而變異、發展，其間自然環境又反為社會環境所操縱，甚而有種即將被掌控的趨勢。因此，終可理解人所創造的社會環境，如體制教育的力量，對於「教養」個體，賦予文化天性，具有相當影響力；而博物館蒐藏工作受制於個體認知、行為，除系統性的體制教育外，更受社會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

博物館是西方的產物，科博館首將國外整套博物館制度引進臺灣，建立一套獨特於國內之蒐藏研究制度。其經由參訪、學習、移植至臺灣落實的適應力，歷經近二十年的發展，其中披荊斬棘之艱辛，和今日運作過程相較，顯出許多值得思考的現象。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受到整體社會對於專業認知不足所產生的影響。專業認知的概念影響深至整體博物館的共識，以及國人對於博物館的概念。基本的概念無法認同，專業知識受到忽略，國人對於“common sense”的經營管理制度，配合「情、理、法」的關係牽連特性，將一種獨特的性格引申至博物館體系中，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力。以編制組織來說，制度優劣實因人而異，很難有所謂的唯一標準，但是因應文化之差異，的確顯出關鍵所在。尤其在我國，公家體制的剛硬難改，沒有彈性空間。檢視蒐藏論述中蒐藏實踐的三大主軸：社會實踐(practice)、詩意性(poetic)和政治性(politics)，分別涉及蒐藏在社會文化中的條件和功能性、個體(individual)自我論述的角度，以及蒐藏物件世界中一種權力操控的掌握/追求。臺灣的自然史博物館蒐藏所形成的社會性格，因為社

會文化教養的功能性，社會文化中個體與個體間、個體與群體間、群體與群體間所形成的權力拉鋸，影響個體與自然物、人為物之間的蒐藏實踐。

## 附註

註1. 事實上，蒐藏計畫擬定之前，科博館事先即對於民間之收藏家進行調查訪問，並撰寫了一本《臺灣民間收藏家之調查訪問報告》，共訪問十三位民間收藏家，以求對於臺灣自然物與人類遺物之蒐藏進行全面詳盡之瞭解。並且於民國71年委請當時國內學術界知名人士，為科博館整理出一套基本的蒐藏資料。委託研究之項目依地質學、動物學、植物學、農學、人類學、人體科學再細分為十八個學門，請其列出具蒐藏、研究價值之自然物，分述類別、型態與行為，標本外所需蒐藏之項目如聲音、照片等，採集、製作標本之費用，甚至希望提供在其研究過程中所採集之標本等等。直至民國73年回收大部分之報告，且得到許多建議。綜合來看，各委託計畫之主持人對於科博館均有甚高之期許，因此均提出許多寶貴意見：「大體說來，生物學之收藏以地方與本土為主，漸及於全世界，古生物與人類學則應於開始時著眼於世界性之發展，此等收藏工作不能脫離研究作業實甚顯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84: 16)。可大致看出科博館早期規劃時，對於蒐藏研究之重視，以及各界學者對其寄予深切之厚望。

註2. 館內資料包含各學組的作業準則，與出國考察報告、收藏計畫等，如由周文豪、葉貴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出版的報告書與收藏計畫，細如參考文獻。

註3. 請參見：劉憶諄 2000 自然史博

物館蒐藏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

註4. 根據館方規定：購買蒐藏品在一萬元以下可由蒐藏經理自行決定，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則由學門負責人決定，十萬元以下由學組主管決定，十萬元以上則須召開標本審查委員會通過。

註5. 科博館的蒐藏品因應展示、科學教育需要，有些藏品長期在常設展中，或是因應特展而由展示組購進一些藏品堆置在展示組中；此外，自然學友之家是科博館實踐科學教育最直接的場所，科教組因而向蒐藏庫借用一些具教育意義的藏品，或另行購置教育用途的物件，作為科學教育的標本。因此除蒐藏庫外，科博館之蒐藏品尚包括展示場、展示組蒐藏品，以及自然學友之家的蒐藏品，典藏管理組亦需統籌之。

註6. 國立臺灣博物館 [www page] URL <http://www.tpm.gov.tw>。

註7. 請參見：劉憶諄 2000 自然史博物館蒐藏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

註8.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98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一、二期營運績效評估暨三、四期建設計畫。

註9. 史密森機構 [www page] URL [http://www.sil.si.edu/Exhibitions/Smithsonian-toSmithsonian/collection\\_03.html](http://www.sil.si.edu/Exhibitions/Smithsonian-toSmithsonian/collection_03.html)。

## 參考文獻

王嵩山 2003 差異、多樣性與博物館。臺北：稻鄉。

周文豪 1985 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收藏經營與管理。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處。

林志明譯 1997 物體系。臺北：時報文化。

林明澤譯 1997 藝術品味與文化資

產。文化與社會。頁：259~275。

臺北：立緒文化。

秦裕傑 1987 現代博物館管理經營：美、日博物館考察報告。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9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一、二期建設暨營運績效評估。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秦裕傑、張譽騰 1990 西歐博物館制度及營運考察報告。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98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收藏計畫。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6a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第三、四期建設暨經營管理計畫。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6b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研究組民國七十五年之工作報告及民國七十六年之工作計畫。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7a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收藏計畫修訂本。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7b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研究組民國七十六年之工作報告及民國七十七年之工作計畫。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7~1995 歷年各月份重要中心工作簡報表（民國76~84）。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8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研究組民國七十七年之工作報告。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88~200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預算總表（民77~89年度）。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9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民國八十年工作報告。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95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庫

- 管理辦法。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97 蒐藏研究組簡介。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98a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蒐藏管理作業準則。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1998b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介。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張譽騰 1994 走在博物館的時空裡。臺北：稻鄉。
- 2000 當代博物館探索。臺北：南天。
- 程延年譯 1987 博物館與收藏。博物館學季刊，1(4): 3~13。
- 葉貴玉譯 1993 自然史博物館蒐藏政策之擬定：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季刊，7(1): 3~20。
- 劉憶諄 2000 自然史博物館蒐藏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 Alexander, Edward. 1996. *Museums in Motion*.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 Ambrose, Timothy & Paine, Crispin. 1995. *Museum Basics*. New York: Routledge.
- Burcaw, Ellis. 1997. *Introduction to Museum Work*.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 Hooper-Greenhill, Eilean. 1992.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New York: Routledge.
- Pearce, Susan. 1995. *Collecting Process*. On *Collecting*. pp.3~3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berts, Andrew. 1988. *Collections Management for Museums*. London: The Museum Documentation Association.
- Vergo, Peter(ed.). 1989. *The New Muse-*

ology. London: Reaktin Books .

收稿日期：95年3月20日；接受日期：95年4月6日

####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展示組研究助理。

## Collecting Practices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Yi-Chun Liu\*

### Abstract

Affected by post-modernism, museum collecting studies are focused on the museums themselves, serving as catalysts for rethinking of 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In natural history museums, curators choose specimens and artifacts and systematically carry out 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naming and management of those specimens and artifacts under specific collection policies. However, the collecting practice is influenced by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s between individual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nd between groups. In particular, this applies to collector conditions and functions in terms of society and culture, self description and pursuit of the power to control collec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nd ethnological fieldwork methods. The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NMNS) was chosen as the case study, and anthropological curatorial staff members were observed and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 collection work of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llection practice and society.

Keyword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ollecting study, society and culture, knowledge construction, social practice, poetic, politics

\* Curatorial Assistant, Exhibits Department,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